



裴光辉 著

中国古代

名瓷鉴赏大系

官窑青瓷

福建美术出版社

裴光辉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官窑青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窑青瓷 / 裴光辉主编. —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10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ISBN 7-5393-1195-9

I. 官... II. 裴... III. 官窑 — 青瓷 (考古) — 鉴赏 — 中国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844 号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官窑青瓷

裴光辉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2.5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5393-1195-9/J.1172

定价: 29.80 元

序

如果说要寻找一种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明史的物质载体,那么就非陶瓷莫属了——华夏民族犹然。

描写一种文明的内涵及其高度,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尺,但总离不了“技术”(广义)和“艺术”(广义)这两个层面。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蕴含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否则即不能成其为“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陶瓷自始至终都是技术与艺术的接合与交融。可以说,不懂得中国古陶瓷就不懂得中华文明。

瓷器是华夏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一创造在西方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东西始到西人那里,竟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玉石雕琢出来的器物,他们没有想到除了上帝能用泥土捏成亚当与夏娃,谁还能用泥巴烧成另外一种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物质!但摆在面前的事实告诉他们这决不是造物主之功而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在坚船利炮撞开所谓“四大发明”的原创国的国门后,“中国瓷器”,却仍然是华夏民族足以傲视西方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陶瓷的收藏热、研究热方兴未艾,但目前坊间能看到的具有独立思考和新知新见的中国古陶瓷著述为数不多,有关中国古陶瓷的系列丛书也为数尚少,且多视角陈旧:或以朝代为线,或以窑口为线。前者以历代政权更替为线,人为割断了中国古陶瓷自身的发展历史,在阅读上也难免支离感;后者以地域窑口为线索往往缺乏对同一古陶瓷品种在不同产地的横向考察。因此决定以历代古瓷品种(名品)为线索和单元,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名瓷大系”,这将是一个展示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新视角,恰当与否尚望海内外博雅指点。是为序。

裴光辉

2002年5月1日于泉州亦玩村

目 录



序

一、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 1

郊坛下官窑

二、是否存在北宋官窑 5

三、修内司官窑发现于 ——

抗战前，乌龟山窑是修

内司不是郊坛下官窑 —— 7

四、郊坛下官窑至今芳 ——

踪未寻 24

五、汴京官窑器的特征 —— 28

六、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 31

七、官窑瓷器的特征 —— 47

八、官窑文献辑注点评 59

官窑青瓷

一、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

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朝廷官办窑厂，目前还众说纷纭。但宋代政和到宣和年间（1111—1127）在都城汴京设置的“官窑”倒是可以确知的，并且是第一次以“官窑”命名的朝廷官办窑厂的开始。

有关宋代官窑的历史悬案实在不少，问题主要围绕两大方面：一是存世（传世和出土）官窑器本身的问题；一是宋官窑窑址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争议颇大。

先说窑址。据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宣政”就是宋徽宗年号“政和”（历时7年）和“宣和”（历时也7年）。中间有“重和”1年，共历时15年。这也是北宋王朝的最后15年。（宣和之后是“靖康”，即遭“靖康之变”，钦宗赵桓被掳，高宗赵构立偏安政府于临安——今杭州，定年号“建炎”，此南渡政权史称“南宋”。）所以顾文荐所载的官窑被称为“北宋官窑”。当时的“京师”是汴梁（亦称汴京，今河南开封），故又称“汴京官窑”。如按上述文献的记载，汴京官窑实际只存在15年便随着金人的入侵、北宋王朝的灭亡而废弃。



宋室南渡后，在新都杭州另立官窑，我们称之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的窑场先后设在两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南宋叶寔的《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



图1 官窑葵瓣口折沿洗（宋）高2.8厘米、口径14.6厘米、底径8.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根据这段记载，南宋的两处官窑分别称为“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和“郊坛下官窑。”

这样宋代官窑就有三处：北宋的汴京官窑和南宋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



图2 官窑六方倭角洗（南宋）高2.5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5.4厘米 六方倭角形，敞口，斜收腹，圈足，釉色灰青，蟹爪纹开片。紫口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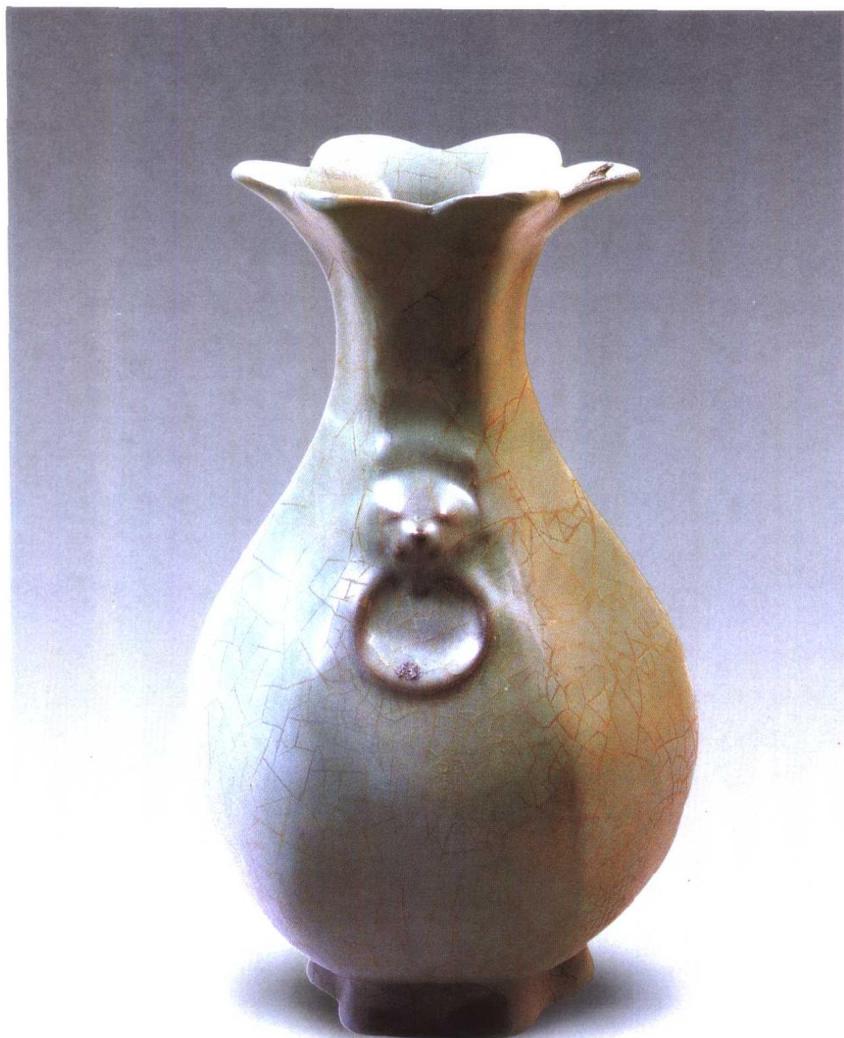


图3 官窑花口铺首瓶（南宋）高25.5厘米，口径11.8厘米 外撇六瓣花口，六楞圆垂腹，外撇六瓣花足，肩部饰衔环铺首一对。釉色粉青，蟹爪纹片。1985年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二、是否存在北宋官窑

汴京北宋官窑具体在什么地方已经无从寻找。因为汴梁入金以后，黄河水患频仍，又经数次黄河改道，汴京城渐被掩埋于泥沙之下。据考古钻探所测，北宋汴京遗址在今开封市地下6米深处，又因黄河河床高悬导致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几乎无法进行，所以要从考古发掘发现汴京官窑遗址恐怕只能是个遥远的梦想。

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汝窑，而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汴京官窑”。也就是否定了顾文荐“京师自置窑烧造”的说法。但以传世官汝瓷和传世官窑器（主要收藏于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和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两相比较，二者在胎釉、造型和工艺上均有所区别，说明它们来自不同的窑口。又，提出“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不只南宋顾文荐一人。与之同时代的叶寔也持同一说法：“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叶寔《坦斋笔衡》）顾文荐和叶寔同为南宋人，均去北宋不远，他们的记载可信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又所引文献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关于京师自置窑烧造的时间，两人说法不一：顾说是“宣政间”，叶说是“政和间”。这说明两人不存在相互袭说的问题，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考察作出的独立判断，也说明他们的结论是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这样的两个结论表明汴京官窑的存世时间在南宋时已说法不一（“宣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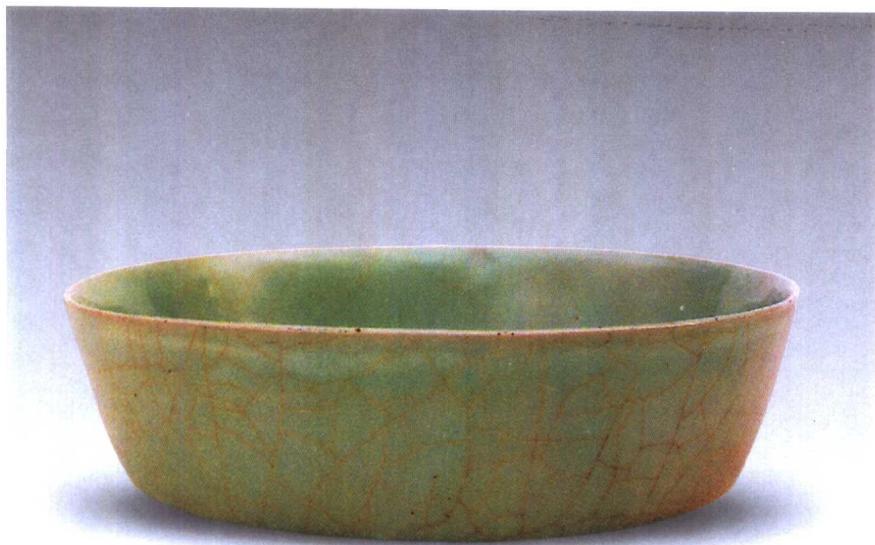


图4 官窑圆洗（宋）高6.4厘米，口径22.6厘米，足径1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间”可能存在15年，而“政和间”最多7年，差别不小），但同时又表明了“汴京官窑”在南宋人那里是被确认无疑的——他们看法不同的只是汴京官窑存世的时间而不是汴京官窑的有无。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叶寘《坦斋笔衡》这段话里，“汝州青瓷”与京师自置的官窑（汴京官窑）是并举的。“遂命汝州造青瓷”的后文是“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已经把两窑（汝窑和汴京官窑）的不同性质点明了：汝窑是命烧的，是贡窑；京师窑是“自置”的，是官窑，两者不是同一回事。

虽说汴京官窑的存在难以否定，但其遗址毕竟已难以寻觅，那么南宋官窑的遗址是不是可以找到呢？

三、修内司官窑发现于抗战前，乌龟山窑是修内司窑不是郊坛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是发掘比较早、调查比较充分的南宋官窑遗址。但它究竟属于修内司官窑还是郊坛下官窑是颇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它逐渐被“公认”为郊坛下官窑而少有人提出质疑，并已在窑址所在地建立了“南宋郊坛下官窑博物馆”。1996年11月，又有人在杭州凤凰山发现南宋窑址，宣布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即修内司官窑窑址。这个结论目前也已被大多数人接受。这样说来，南宋政权先后建立的两处官窑窑址——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都已经找到了。但笔者认为先后在乌龟山和凤凰山发现的南宋官窑遗址其实都属修内司官窑，而郊坛下官窑迄今尚未发现。换句话说就是，在乌龟山建立“南宋郊坛下官窑博物馆”的地方应是修内司官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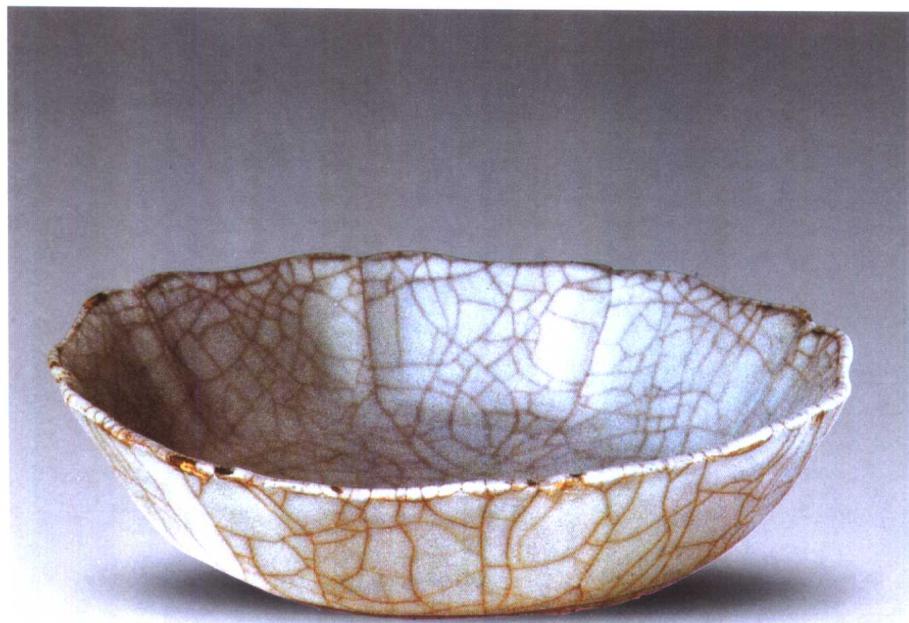


图5 官窑花口洗（宋）高4.8厘米，口径18.7厘米，足径11.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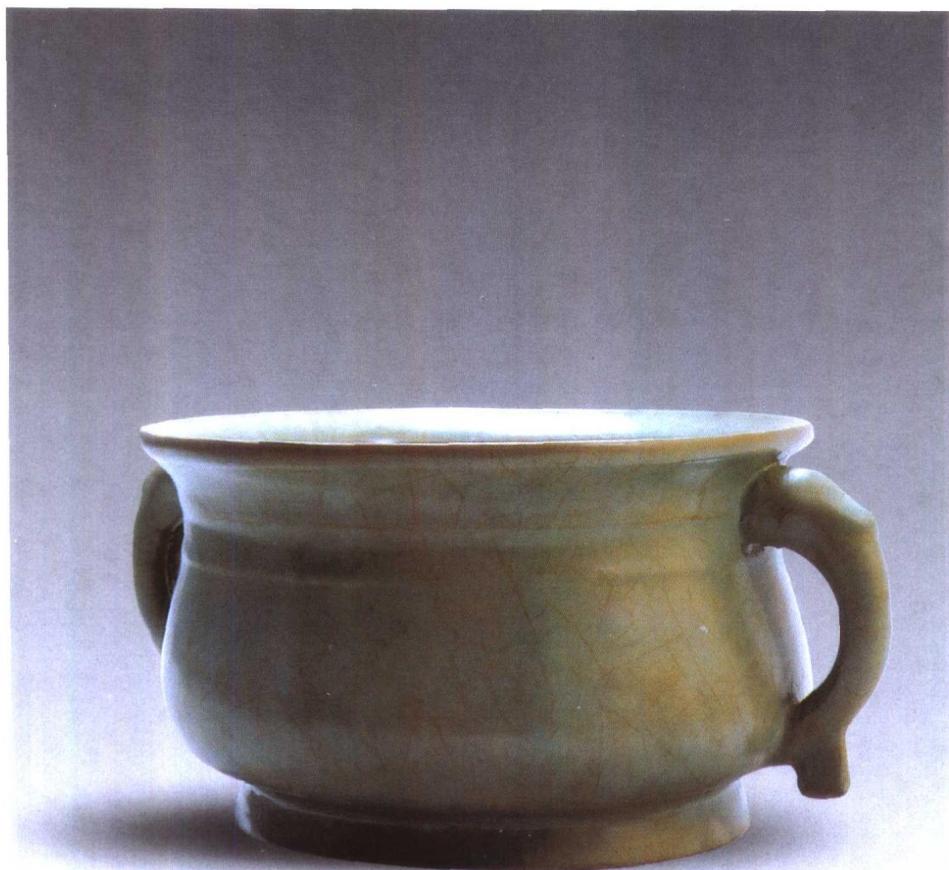


图6 官窑簋式炉（南宋）高10.5厘米，口径17厘米。撇口，束颈，扁圆垂腹，外撇大圈足，颈腹部饰螭耳一对。釉色粉青，蟹爪纹开片。1985年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其实早在民国二、三年（1913—1914）间，乌龟山南宋官窑窑址就被人挖掘过，零星瓷片流入古玩市场引起中外一些中国古陶瓷学者的注意。1930年以后，流入古玩市场的南宋官窑残器、瓷片渐多，甚至出现完整器和窑具。开始有古陶瓷专家和



图7 官窑葵口碟（南宋）高2.5厘米，口径14.4厘米 葵瓣口，浅弧腹，大圈足。釉色灰青，蟹爪纹开片，外底有支钉痕五枚。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图8 官窑暗龙纹洗 (宋) 高5.6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12.3厘米 唇口，浅直腹，平底，矮圈足。釉色粉青，金丝铁线开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爱好者前去访古。

据1940年1月发表《宾鸿堂藏器——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作者朱鸿达先生所言，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江干乌龟山一带”。抗战前朱鸿达曾到乌龟山麓勘察，发现了窑基和窑砖，搜集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并考证此地即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朱鸿达还将他搜集到的修内司官窑的20件整器（有贯耳壶、双鱼洗、鹅颈瓶、鬲式炉、杯、碟、碗，甚至还有一件“皆山如来造像”）以及大量残片、窑具和乌龟山全景之图片编成《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发表。可惜这20件价值连城的修内司官窑器已随朱鸿达先生的故去而不知下落，可谓人琴俱亡，只留下这些上个世纪40年代的黑白印刷图册令人遐思不已。可怪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古陶瓷专著或有关宋代官窑的专论都不见有人提到朱鸿达其人其书。此君对中国古陶瓷研究实有贡献，是近现代以科学眼光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先驱者之一，而居然湮没无闻，殊不应该。现不妨摘录近人邹安谨的一段话以见其一斑：

朱君鸿达法律专家也。富著作兼攻金石、陶瓷之学，数十年如一日。首创陶瓷分治之说，谓陶自陶，瓷自瓷，不能合而为一。盖朱君所著之古瓷图录□（该字不清，似为“确”字）认瓷自汉始也。余于金石古陶略有所见，而瓷则自居门外。朱君尝谓治瓷者约分三派：一文字，二实验，三以科学方法。合三派而一之庶几有□（该字不清，似为“济”字），故每闻有古窑基发现，必躬往考察。远自山西、河南，近如龙泉、上林湖及本郡官窑，一审定色质，化验成分，并瓷片、窑具而辨别之……（邹安谨《修内司官窑图解序》）